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要继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以认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们国家文化形象建构的前进方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我们国家文化形象建构的时代重任。

“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构成,是国家对内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对外产生亲和力和感召力的“软实力”。“国家文化形象”理念的提出,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

谈国家文化形象,不能不谈国家形象。学者们认为,“国家形象”是国内外民众对一个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总体形象认知和印象评价。在这个总体认知和评价中,经济状况和政治主张是首当其冲的;作为政治主张延伸的两翼,军事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也会引起高度的关注。对于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的和平发展,世界格局中的认知和评价多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中起伏消长。这种对于中国国家形象“他塑”(即“被塑造”)的局面,学者们指出是西方发达国家难以摆脱(也有不愿摆脱)“本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但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威胁论、崩溃论还是责任论,主要是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认知和评价;即便是比较客观些的“中国道路”的审视,似乎也缺失“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在我国当今国家形象的建构中,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应当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了。

早在20世纪伊始,梁启超便在1901年所著《中国国史序论》中,将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分为3个阶段,谓之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所谓“世界之中国”是指近代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遭遇列强的阶段。一场“鸦片战争”,不仅掠地索款,而且将中国国民形象糟践成“东亚病夫”;一伙“八国联军”,不仅蚕食鲸吞,而且将中国国家形象喻说为“一盘散沙”。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彼时积贫积弱的中国似乎也无“形象”。学者们认为,21世纪以来,中国进入“国家形象”的觉醒期。这不仅意味着有了对“国家形象”的要求,而且意味着要思考“国家形象”的品质。在“国家形象”品质的思考中,“国家文化形象”日益凸现出来,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

建构国家文化形象,是我们国家摆脱贫穷、实现温饱、迈向小康征途上的文化抉择,也是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进入“国家公关时代”的文化召唤。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体现着“文化自觉”的时代高度。

建构国家文化形象,虽说是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构成,但一般说来是国家形象初步确立后的文化支撑或文化调适,是国家综合国力快速增长中的文化抉择。关于国家形象的基本定位,胡锦涛总书记

文化自觉与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

□于 平

“七一”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我国“国际地位”的表述,明确了我们建构国家形象及其文化形象的基本定位。事实上,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不仅仅是文化自身的事情,它更应服从于国家形象的总体塑造,它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

如前所述,国家形象及其文化形象作为国家软实力,对内要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对外则要产生亲和力和感召力。也就是说,国家形象、特别是国家文化形象的建设,更应从其文化功能上去考虑。文化人类学大师费孝通早就看到:“经济上的休戚相关和政治上的各行其是、文化上的各美其美,在人类进入全球化进程后会形成一个大矛盾。这给我们带来一个不能不面对的问题,即文化自觉与文化调适的问题”。无疑,国家文化形象首先要对本国民众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但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公关时代”,“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说法只是“文化相对主义”的绝对主张。作为对“本文化中心主义”的反拨,“文化相对主义”反对以某一文化标准来衡量另一文化实践,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但置身“国家公关时代”的国家文化形象建构,应注意到费孝通提及的“文化调适”的课题。通过“文化调适”对他国民众产生亲和力和感召力,可能标志着我们“文化自觉”的时代高度。

我们对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充满“自信”,因为我们血液里流淌的是五千年不间断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充满着“厚德载物”的生存大智慧和“自强不息”的发展硬道理。

应当说,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曾有着辉煌的形象。至今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仍引以为豪的,是我们五千年不间断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不间断,在“源远流长”中奔涌的是“活水清波”,在“博大精深”中崩露的是“仁心义胆”。五千年不间断,这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史的奇迹,本身就是我们国家文化的底蕴。的确,许多文明古国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衰败了,许多古国文明也在人类文明的现代

场景中出局了。那么,是什么铸就了中华文明“五千年不间断”的生命机理呢?那就是我们“厚德载物”的生存大智慧和“自强不息”的发展硬道理。这是我们当下建构国家文化形象的文化自信,我们自信能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在一个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公关时代”,我们可以把“自强不息”理解为我们民族持续迸发的文化创造活力,而“厚德载物”则是我们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公关”基石。前者体现为“主体能动性”而后者体现为“本体包容性”。可以认为,“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永不止息的民族精神,甚至可以说已深深沉淀于“集体无意识”的民族记忆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对全党提出的“两个务必”的警醒,就具有“自强不息”的内涵。胡锦涛总书记曾率领中央领导集体重温西柏坡精神,也在于铭记“两个务必”高扬“自强不息”。事实上,“自强不息”作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内核已是世所公认,再加上我们又以“厚德载物”的常态应对国际交往,我们一定能建构一个在国际格局中具有亲和力和感召力的国家形象。

建构国家文化形象是在改革开放中的文化实践,我们一方面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要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化“文明的冲突”为“文明的共荣”是我们信守的“文化自信”。

建构国家文化形象,是我国过去30多年来快速发展的“水到渠成”。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指出:“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这是一个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自信能够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不仅是因为我们曾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且是因为我们善于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

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西方学者在经历“国家

声望”、“国家软实力”的分析后,被塞缪尔·亨廷顿以《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眼光来审视。由于地域和历史的原因,文明的差异是一个普遍的存在。实际上,差异的文明并不必然构成文明的冲突,因为某一文明特质的形成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理解、文化包容、文化调适与文化和解的机理。如亨廷顿著作的论题所示,所谓“文明的冲突”关系到的是“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显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和平崛起”而言的。也就是说,制造了“话语体系”乃至“普世价值”的强势文明,在向发展的弱势文明施加影响乃至强加干涉时,遭遇弱势文明为生存和发展选择的坚守和抵御。作为“五千年不间断”的中华文明,本身是一种经历过不同文明碰撞、交融与和解的“多元一体”的文明,本身是一种具有开放、包容与吸纳气象的文明,我们能够通过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实现全球化进程中“文明的共荣”。

建构国家文化形象要有“自强”意识,而“文化自强”的实质在于贯彻“人民至上”的理念。建构“人民至上”的国家文化形象,是这一形象实现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保证。

虽然国家文化形象要在世界格局中被认知和评价,但首先应该得到本国民众的认同和守望。在谈到我国面向未来的文化建设时,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始终贯穿着“人民至上”的理念。具体而言有这样五个方面:一是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二是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使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三是在全体人民中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四是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五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作活力持续迸发的新局面。显而易见,文化建设的这五个方面将使我们建构起一个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体现人类普遍价值取向的国家文化形象。

国家文化形象建构贯穿“人民至上”的理念,说明这个建构的着眼点不是“文化大师”而是“文化大众”。确有一些学者认为,一个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不能缺席“文化大师”;但事实上,一个

国家民众的文化素质、人生格调、生活方式、精神追求比大师们关于国家形象的言说更为本质。还有,文化大师之所以是文化大师,不仅在于他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精神的传道者,更在于他是一个国家文化大众的代言人,他要采集“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来擎举“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光”。

建构国家文化形象是在世界格局中的文化实践,是一个“自塑”和“他塑”互动的过程。我们不仅要突破“跨文化传播”的瓶颈,而且要矫正西方“本文化中心主义”的镜像。这是我们“文化自强”的应有之义。

国家形象及其文化形象的建构,是一个实践性的课题也是一个学理性的课题。也就是说,当我国自21世纪进入“国家形象”的觉醒期之后,关于“国家形象”的学理研究已被西方学者关注多年了。约瑟夫·奈认为国家形象是“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他认为“传统观念认为那些拥有最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将夺得优势。但在信息时代,真正赢家是那些最会讲故事的国家”。这个“讲故事”的讲的就是“国家形象”。作为赢家,体现的是“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力而不是通过强制来实现所期望的目标和结果的能力”。也就是说,国家形象及其文化形象并不仅仅由一个国家的客观现状来决定,它还包括这个国家的意愿和诉求,而后者就涉及到“跨文化传播”的能力。

实际上,不仅一个国家的意愿、诉求与这个国家的客观现状有差距,一个国家自身的国家想象与国际社会对它的想象也有差距。如果说,前一个差距是理想的国家形象与现实的国家形象的差距,后者则涉及“跨文化传播”能力和“本文化中心主义”偏见的问题。在我国国家形象诉求的表达中,我们较多地注意到“跨文化传播”的能力的技术层面;但真正的症结发生在观念层面,即西方那个“本文化中心主义”以其“话语体系”和“普世价值”构建的形象评价体系。面对这个形象评价体系,我们的文化形象建构也曾出现过某些焦虑,文学上那个“诺奖”情绪和得不到“诺奖”的纠结就是一例。既然我们认识到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是一个“自塑”与“他塑”互动的过程,我们就要深入思考“跨文化传播”的问题,特别是这个传播中作为形象评价体系的观念偏差及恶意误读。重要的是,国家文化形象建构终究是国家诉求的表达,终究要落实到国家现状的提高。有这个方面的自觉、自信和自强,我们才会在有效的“跨文化传播”中建构起真实的“国家文化形象”。这是我们在世界格局中产生亲和力与影响力的基石。

文化自信与文艺创作(13)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城市化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最重要的主题。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对这个过程中引发的深刻而严峻的问题,还是新生的健康的精神文化,我们的文学都没有做出应有的回应,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萎缩消退。人们不禁要问,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还能复活吗?这也许并不成为一个问题。在西欧,19世纪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迅猛发展的时期,而正是这一时期,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达到巅峰,产生了像巴尔扎克、狄更斯、左拉、刘易斯、马克·吐温等一大批批判现实主义大师。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使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缺少对现实的深刻表现?

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城市化与19世纪西欧社会这两个不同时代不同空间的社会形态,固然有诸多的相通之处,但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在今天,大众传媒较以往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大众传媒铺天盖地,它所提供的虚构信息以如此“真实”的方式包围着我们,它甚至狡猾地捕获一切可能逃出既有意识形态控制的感觉形象并迅速使其归顺。一首独特的歌曲,一个古怪的文学意象都有可能成为某个大众消费品的符码,其原有的形象和意义被迅速遮蔽。在大众传媒的重重包裹中,对真实生活的切近,变得极为艰难。真正的问题还在于,在大众传媒时代文学面临着深刻悖论:一方面,文学需要同大众传媒的同质的俗世的意识形态划清界限并从中突围,从而显现其自身的文学性,但另一方面,文学又需要大众传媒的传播来发挥其社会作用,这个时候文学又必须呼应大众传媒的编码规则,否则将会被大众传媒所抛弃。

但我们并不由此就必然得出悲观的结论。三个方面的理由让我们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突围充满期待。

首先,大众传媒的神话像所有的其他神话一样,必将走向坍塌。大众传媒可以让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拟的“真实世界”中,控制着我们的感觉与感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世界,但它毕竟只能想象世界的本质而不能真正把握甚至改变世界的本质,它在不断征用各种层出不穷的生动的个体事物时却无法改变生长这些事物的深厚的土壤,现代化、市场经济、城市化社会的深刻内容与各种尖锐矛盾不可能由“空洞”的大众传媒表达,正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那样,大众传媒所负载的信息,参照的“并非某些真实的物品、某个真实的世界或某个参照物,而是让一个符号参照另一个符号,一件物品参照另一件物品,一个消费者参照另一个消费者”,现代社会的深刻内容与尖锐矛盾如同地底的岩浆,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必将形成巨大的火山喷薄而出,而这时,大众传媒就面临着皇帝的新装一样的处境。事实上,一些先行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了对大众传媒的反思和批判。L·P·梅耶在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前言中就指出:“《消费社会》行文精炼,年轻一代要认真研读。它的任务就在于:砸烂这个就算不上很衰的,但算得上物品丰盛的,并由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竭力支撑着的恶魔般的世界,这个时时威胁着我们每一位的世界。”就是大众,对大众传媒的质疑也不绝于耳,尽管这种质疑大多最终仍然被大众传媒所俘获,但质疑本身还是让人们或多或少窥见了大众传媒的裂隙。

当然,我们不能坐等大众传媒神话的破灭,对大众传媒的反思将有助于我们的作家们尽可能深入地切进生活,获得生动而深刻的文学体验,而这正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根本。19世纪的西欧,巴尔扎克们正是以其对社会生活的深入,正是因为形成了对社会生活的深刻自我体验,才突破了各种各样的遮蔽看到了那个社会的本质,对生活的深入甚至颠覆了他们既有身份所赋予他们的平庸的思想,从而创造出了诸多生动的深刻的文学形象。尽管,相对于巴尔扎克们,我们的作家身处大众传媒的包围,我们深入生活的难度也许更大,但这不应成为我们逃避现实的理由,如果我们有了对大众传媒的深刻认识与反思,我们从其包围中突围、切进真正的生活质地就成为一种可能。

最后,我想说的是,现实主义其实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熟悉的在文学史上取得巨大成就的批判现实主义,表现为对生活中不合理的阻碍人的自由与发展的事物的揭示与批判,另一方面表现为对现实中合理的有助于人的自由与发展的事物的深刻肯定,20世纪50—70年代取得一定成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多地属于这一方面。我们今天说的现实主义文学应该包括上面两个方面的指向。既不能无视现代化、市场经济带来的深刻矛盾,也不能对现代化、市场经济中新生的健康的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意识形态、行为方式无动于衷。抛开近现代历史不说,即使从20世纪80年代算起,我们的现代化也有了30多年的历史,问题也好、新生的健康的意识形态也好,应该初露端倪,我们的作家可以也应该深刻地同时也是审美地把握它。特别是后者,对于我们意义更加重大。如果我们不想因为对现代化问题的种种批判而彻底否定现代化,我们就必须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积极的健康的意识形态进行审美把握与表达。20世纪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尽管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有一点却值得我们借鉴。那同样是一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作为现代化方案的社会主义对于传统来说同样是深刻的革命,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家却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对社会主义做出了自己的审美把握。周立波的合作化小说从审美意义上来看,到了今天也仍然耐人寻味。这给了我们今天的文学及时地、正面地、审美地把握现代社会以深刻的启迪。

洞察

推进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

□曹竹青

“古远清与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近日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召开,80余位专家参加会议。他们探讨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和未来发展,总结了古远清对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贡献,也论及古远清的治学方法。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地位问题,陈国恩认为:世界华文文学学科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须明确华文文学要研究些什么,由谁来研究华文文学,厘清为谁而研究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不能当做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来研究,不然可能会被认为是对海外华文作家主体性的不重视,甚至可能引起尖锐的国际政治问题。华文文学研究的重点,应是它既不同于中国文学而又介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的那种身份,以及这种身份所包含的海外华人面临中西文化冲突时如何从自身的生存经验出发融合中西文化矛盾。胡德才认为:古远清是祖国大陆学界较早开展台港澳文学研究的学者,也是至今大陆学界拥有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资料十分丰富、研究成果丰硕、影响广泛的学

者。他以一人之力,先后完成有关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理论批评史、台湾、香港新诗史和《海峡两岸文学史》6部文学史论著,在海内外出版的专著和编著计42种,其中台湾11种,总计1203万字。古远清在海内外推出了多部学术专著,他的学术兴奋点,是在台港澳文学研究尤其是台湾文学研究。陈建华认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前沿的学术视角,贯以始终的私家治史,善于论争的治学风格,是古远清研究台湾文学和港澳文学的重要特点。

在学术界,人们称古远清为“拼命三郎”,樊星说他堪称文学研究界的劳动模范。刘川鄂则认为,当代中国,学术之于学者,是职业、是产业、是事业。视学术为职业者,以饭碗的心态对待学问。早早把自己钉在某个专业领域,按通常的学术准则行事,从助教到教授,按部就班,干到退休。学术上小有贡献,生活上逐渐安逸,平实亦平淡。视学术为产业者,以经商之道经营学问。会联络、擅出镜、会跑课题、会报奖获

奖,名利兼收、官学兼顾。这种学者最擅长做能“来菜”的学问,是时代学术的弄潮儿。如此能人,文理科教授兼有,做一辈子学问真有点大材小用,浪费了他自己的才华,但他们也浪费了学术。视学术为事业者,是把个人才华、志向、兴趣、生命与学问融为一体的人,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不计好处但求真知,不擅经营只会苦做。这是书痴型学者,这是传统型学者。古远清即是其中之一,除了学问,他什么装都进不去。他在学问中找到了乐趣,实现了自己。你可以不赞成他的某些学术观点,你可以对他篇幅浩繁的某些论著的含金量质疑,你也可以对他重文学事件轻审美评判的学术指向有所保留,但不得不服他勤勉的个人化的写作,不得不服他做学问的一片痴心。你怎么会相信他已年近古稀?一个学痴,一辈子全身心在他钟爱的文学研究事业上,他超越了年龄,战胜了时间。

古远清是位文坛怪杰。尽管绵绵秋雨打湿过他的衣裳,但他的学术研究及自信心一直不减。在这次会上,他发布的“自力重生”三书有:作为研究资料汇编的《古远清文学世界》、由海内外百余位学者评说的《古远清这个人》以及《古远清所藏书信选》,其中前两本已在香港出版,后一种也将在内地出版。

综述

形象本身就具有善和担当的道德价值。此外,黄运全还指出:在《拯救》中,随着故事的演进,先后出现刘浪对柳叶的拯救,刘浪对黑牛的拯救,以及被拯救者柳叶等人对拯救者刘浪的拯救;而这些拯救既有对生命和生活的拯救,也有对于灵魂和智思的拯救;这一切既是关于当下的拯救,又包含了对人类永恒的拯救……如此思索探去,《拯救》这部小说不仅思想力是出色的,其想象和构思也是有突破的。

叙事模式的创新

《拯救》的叙事模式创新也是与会评论家热议的话题。小说的叙事以两个时态交替进行,一是当下进行时(“去年”春夏),一是过去进行时(最近30多年),“过去”被切碎后嵌在“当下”,而这种“嵌”的支配者则是主人公“我”的“悬疑意识”;同时,作品又采用了“一、二、三”不时变换的手法。显然,在这样一部40万字的长篇小说中,操作如此繁复的叙事方式,没有对世事的潜沉、对人物的把握及高超的统筹力,是难以达成的。梁必文指出,这种叙事方法在过去的中国小说中几乎是没有的,作者依据小说事件的推进和人物心理的变化,自然(或必然)地将不同时态、不同人称进行交替转换,使情感的抒发和反思的表达在对比和冲突中凸显张力,从而实现了作品艺术表现的最有效果。李遇春说,文本中始终暗含着缺席的“我”与在场的“你”之间的心灵对话或者自我审视,使这部作品的反思变得真挚而富有感染力。周新民说,《拯救》之所以能实现对当下物质社会精神病象的深刻反思,其创新的叙事策略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杜海波则认为,这部小说是一个将哲理寓于诗意叙事的文本,让人读来特别亲切。

也有论者认为,《拯救》的叙事方式容易影响人物性格的鲜明性和细节描写。但另有论者认为,现代小说已有很大发展,那种重在描摹人物外在特征和描写场景细节的做法已不是小说的主要样式;恰恰相反,就《拯救》现有的文本来看,不仅人物性格(尤其是内在品格)是丰满而鲜活的,其人物外貌也各有特征;至于细节描写,虽然常常放弃传统的工笔画,但大量细节则是包含在叙述之中。总之,《拯救》的叙事模式是一次成功的探索与创新。

文学的反思不能中断

□胡卓文

作家刘诗伟的长篇小说《拯救》是一部以现实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新作。这部小说是作家在现实的风口浪尖上生活和搏斗30年后思考沉淀的产物。9月3日,作家出版社与湖北省作家协会在武汉联合举办了《拯救》研讨会。湖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黄运全主持研讨会。作家出版社副主编、作家张水舟介绍《拯救》是作家出版社今年推出的一部重要作品。与会评论家认为,该作“拿在手里有看头,看完之后有说头,说过之后还有想头”,并针对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展开了热烈讨论。

盛世反思的探索

江岳认为,《拯救》从整体看,是一部新的反思小说,它不同于80年代对前30年的反思,是盛世中的后反思。在当今社会正面临道德拯救的严峻时刻,《拯救》的作者与时俱进,慧眼独具,将笔锋触及当今社会的这一根敏感的神经,揭示了时代的第一个重大主题,开启了文学的又一轮反思。王泽龙认为,《拯救》是中国农村、都市社会变迁与精神蜕变的双重交响,是近30年社会道德嬗变的诗性反思。樊星说,《拯救》中最富思想价值的,是描写主人公自省、同时忧患的段落和篇章,这使全书散发出浓浓的“1980年代”气息(那是一个“新启蒙”的时代)。何锡章也认为整个作品的叙事实现了反思的目的。李遇春在分析了文学现状后指出:当下中国文坛呼唤的是反思新中国最近30年历史的